



统计与信息论坛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ISSN 1007-3116, CN 61-1421/C

## 《统计与信息论坛》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949—2019年  
作者：熊小林，李拓  
收稿日期：2022-03-03  
网络首发日期：2022-09-21  
引用格式：熊小林，李拓.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1949—2019年[J/OL]. 统计与信息论坛.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61.1421.c.20220920.0900.002.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 【经济统计】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949—2019 年熊小林<sup>1</sup>, 李拓<sup>2</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国家统计局 综合司, 北京 100045)

**摘要:**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基于泰尔指数对 1949—2019 年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量化测度, 并进一步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地区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 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周期性波动态势, 总体来看, 当前收入分配差距略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且呈平稳缩小态势。城乡收入不平等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偏大的主要成因。其二, 从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来看, 经济增长、教育发展、宏观调控总体上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高级化缩小了地区收入分配差距, 但产业结构非农化则产生反向作用; 经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则扩大了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其三, 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来看, 产业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长总体上缩小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效果有所减弱; 对外开放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产生了积极作用; 教育在改革开放之前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改革开放之后这种负面效果不再显著。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 共同富裕; 泰尔指数; 影响因素**中图分类号:** F328**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7-3116(2022)10-0039-14

**引用格式:** 熊小林, 李拓.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949—2019 年[J]. 统计与信息论坛, 2022, 37(10): 39-52.

**Citation Form:** XIONG X L, LI T. Research on residents' income gap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 1949—2019 [J].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information, 2022, 37(10): 39-52.

##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推进共同富裕更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的奋斗目标, 2021 年 8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强调, 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发展共同富裕要牢牢把握“共同”和“富裕”两个关键要义, 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这两件事情办好。

从“做大蛋糕”也就是实现“富裕”的目标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人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 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2020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2 万元, 比 1949 年提高了 600 多倍, 中国也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 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并即将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下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民生持续改善, 人民收入水平继续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提升仍然具有扎实稳固的发展基础。但从“分好蛋糕”也就是实现“共同”的目标看, 中国城乡、地区、群体间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 2020 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2 万元, 是收入最低的甘肃省的 3.6 倍;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4.4 万元, 是农村

**收稿日期:** 2022-03-03**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 70 年民生发展研究”(2019MZD015)**作者简介:** 熊小林, 女, 湖北黄冈人, 硕士, 副编审, 高级经济师, 研究方向: 农村经济;

李拓(通讯作者), 男, 河南洛阳人, 博士,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

居民的 2.6 倍;按五等份分组的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8 万元,是低收入户的 10.2 倍<sup>①</sup>。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约束导致中国基尼系数长期高于 0.4 的国际警戒线,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步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由此可见,破解收入增长的不平衡、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切实“分好蛋糕”、推进共同富裕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而持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首先必须厘清两个关键问题,即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究竟处于何种状态,其发展趋势如何?哪些经济社会因素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为了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本文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量化测度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中国地区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推动居民收入分配持续改善进而发展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学术界关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十分广泛。从本文的研究视角出发,关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文献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收入分配差距的量化测算,二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在收入分配差距测算研究中,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都是最常用的指标,但受计算方法差异较大、样本数据使用各异、研究主体存在一定区别等因素影响,相关测算结果不尽相同、结论观点各异。其中,对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发展态势的不同看法是相关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歧,如 Chang 使用基尼系数分析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趋势,指出改革开放后较高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会长期持续<sup>[1]</sup>;而罗楚亮等基于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测算结果则认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长期以来持续处于高位震荡状态<sup>[2]</sup>。不少学者利用各类方法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了测算,其结果差异明显。如李天健和王润红以基尼系数为核心指标测算了中国 1995—2016 年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结果显示 2016 年基尼系数为 0.317,比 1995 年扩大了 0.105<sup>[3]</sup>;而吴彬彬和李实基于 CHIP 数据的分析则显示,2002—2013 年间中国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持续缩小态势<sup>[4]</sup>;张涛综合利用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和 CHIP 数据,基于改进的回归方程分析方法开展的测算显示,1985—2008 年中国总体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缩小,呈现一定的“倒 U”型特征<sup>[5]</sup>。除了上述常规测算方法外,也有部分学者使用新的数据和方法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使用夜间灯光数据测算基尼系数和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测算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等<sup>[6-7]</sup>。

关于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同样较为丰富,相关文献主要讨论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两大类。从经济因素角度看,不少研究分析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差距随经济增长变化的“倒 U”型库兹涅茨曲线问题<sup>[8]</sup>。但这一现象是否存在也引起了广泛争论,如 He 和 Zou 基于中国历史资料的分析认为,这一曲线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sup>[9]</sup>;而王小鲁和樊纲基于人均 GDP 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的实证检验则显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变化<sup>[10]</sup>。同时还有不少研究分析了产业结构、经济开放、财政收支等因素对城乡或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sup>[11-13]</sup>。在经济因素之外,还有不少社会因素也显著影响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变化,其中城镇化是最受关注的影响因素,且不少研究认同城镇化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存在积极效应<sup>[14]</sup>,认为这种作用效果主要来自城镇化带来的收入增长、就业增加和福利改善<sup>[15]</sup>;当然,还有许多研究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偏重城市、产业结构与城镇化耦合水平低、城镇化诱发跨地区人口流动等原因,城镇化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或二者呈非线性相关关系<sup>[11,16-17]</sup>。此外,教育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被认为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但对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效果也存在正负两种观点<sup>[18-19]</sup>。还有部分研究表明,公共服务水平也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sup>[20]</sup>。

综上所述,过往关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从梳理中国近 70 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发展变化的角度出发,相关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1)大部分量化分析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展开,少有文献对更长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测算,不能很好地展示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历史全貌;(2)在此基础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分解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未能较好地探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内部变化和阶段性特征。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相关影响因素研究也很难全面反映全国 70 多年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发展变化背后的驱动机制。基于此,本文研究尝试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1)通过拓展数据来源和优化测算方法,对改革开放以前居民收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相关数据测算。

入分配差距进行估算,系统展示1949—2019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2)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分解为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由此系统分析70多年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结构性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相关经济社会因素对城乡和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以期为推动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优化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目标逐步实现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测算与分析

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量化测度是探讨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推进共同富裕发展有效路径的前提基础。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量化测度的方法及测量结果学术界尚无统一定论,尤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变化缺少完整连续的定量分析。为此,本文首先以国家统计局住户收支调查等数据为基础,对中国1949—2019年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量化测算,直观展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历史变化,以期为优化居民收入分配、逐步推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参考,同时也为后文的影响因素分析奠定数据基础。

### (一)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使用的1949—2019年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以及《1954年农家收支调查简要资料》等,部分缺失数据进行了线性插补处理。

测量1949—2019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需要的主要基础数据是中国31个省份(未包含港澳台地区)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sup>①</sup>。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统计体系逐渐趋于完善,居民收入的数据统计也较为完整,因此1978—2019年分地区分城乡居民收入数据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等资料中即可获得。但改革开放前相关统计资料十分稀缺,仅有个别年份的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数据,因此需要对1949—1977年各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行估算。

改革开放前城镇居民收入虽然缺乏直接的统计数据,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工资是绝大部分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唯一收入来源,因此可以使用1949—1977年各地区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作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替代变量。但职工工资代表的是职工个人收入,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代表了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因此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校正。考虑到1992年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并未正式起步,1978—1992年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与改革开放前并无明显差异,因此使用1978—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作为改革开放前数据的校正依据。基于此,1949—1977年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估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text{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_i = \alpha \times \text{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_i \quad (1)$$

其中, $i$ 表示地区, $t$ 表示年份, $\alpha = \frac{\text{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1992)}{\text{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1978-1992)}$ 为调节系数。1949—1977年城镇职工平均货币工资数据主要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对于个别地区个别年份的缺失数据使用线性插补法进行补齐。

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统计数据缺失更严重。但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收入来源同样较单一,即主要来自粮食、经济作物等农业种植收入,且在政府定价和统一收购时代背景下,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多少与农产品产量高度相关。因此,本文分别在各省份选取了粮食产量以及该地区的代表性经济作物产量作为估算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依据,相关经济作物包括了油料、糖料、棉花等。据此,1949—1977年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估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text{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_i = (\alpha \times \text{人均粮食产量}_i \times 60\% + \beta \times \text{人均代表性经济作物产量}_i) \times \gamma \quad (2)$$

其中,人均粮食产量、人均代表性经济作物产量分别使用该地区总产量除以农村居民人口数得到,粮食产量乘以60%则是因为相关资料显示大致平均有40%左右的粮食以“交公粮”的形式无偿上缴国家,因此不能成

<sup>①</sup> 本文利用《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相关资料对四川—重庆、广东—海南、河北—北京等进行过行政区划调整的地区数据进行了倒推分劈。对于部分年份缺失的历史数据,则根据相关省份相近年份的分劈比例进行插补。

为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来源。 $\alpha$ 、 $\beta$ 、 $\gamma$  分别为不同的调节系数,用来将农产品产量数据转化为收入数据,因此这三个系数的确定也是测算的关键所在。为了确定粮食产量和经济作物产量的调节系数  $\alpha$  和  $\beta$ ,本文基于部分年份的全国数据构建如下的时间序列模型<sup>①</sup>:

$$\text{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_{it} = \alpha_{it} \times \text{人均粮食产量}_{it} + \beta_{it} \times \text{人均代表性经济作物产量}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将样本年份全国粮食人均产量的回归系数作为调节系数  $\alpha$ ,将各种经济作物的回归系数作为调节系数  $\beta$ ,据此可以计算人均农产品加权产量,而后再将对应年份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这一产量之比的年均值作为调节系数  $\gamma$ ,最后将上述系数和各地农产品人均产量数据代入式(2),即可估算出改革开放前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此外,从调节系数的计算结果看,各年份间农产品加权产量与人均收入的比值<sup>②</sup>总体保持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使用农产品产量数据估算农村居民收入的可行性。

## (二) 测算方法

测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常用的综合指标包括了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变异系数、阿特金森指数等。其中,基尼系数应用最为广泛,但其要求以详细的收入分组数据为支撑,这与历史数据的可得性较不匹配,且基尼系数存在对低收入群体收入变化反映较迟钝的弊端,也增加了测算结果的可能误差;变异系数受样本异质性影响明显,可能导致测算结果失真;阿特金森指数的计算过程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同样难以客观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变化。相比之下,泰尔指数较好地克服和回避了上述各指数测算方法的弊端,同时还具有可分解性,因此本文选择泰尔指数为核心指标,测算 1949 年以来中国 70 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泰尔指数的基本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text{Theil} = \sum_{i=1}^n \left( \frac{I_i}{I} \times \ln \left( \frac{I_i/I}{P_i/P} \right) \right) \quad (4)$$

其中, $I_i$  为  $i$  地区的居民总收入, $I$  为全国居民总收入, $P_i$  为  $i$  地区人口数据, $P$  为全国人口总数。泰尔指数大于 0,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泰尔指数还可以分解为组内泰尔指数和组间泰尔指数。假设包括的  $n$  个样本被分为  $K$  个组,则泰尔指数可以分解为:

$$\text{Theil} = T_g + T_w = \sum_{k=1}^K \left( \frac{I_k}{I} \times \ln \left( \frac{I_k/I}{P_k/P} \right) \right) + \sum_{k=1}^K \left( \frac{I_k}{I} \times \sum_{i \in k} \left( \frac{I_i}{I_k} \times \ln \left( \frac{I_i/I_k}{P_i/P_k} \right) \right) \right) \quad (5)$$

其中, $T_g$  和  $T_w$  分别表示组内泰尔指数和组间泰尔指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收入数据为基础计算的加权泰尔指数反映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为了更好地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两个层面综合反映全国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在实际测算中,对传统的泰尔指数测算及分解方法进行了细微调整:将全国 31 个省份的城镇和农村分别看作不同的样本,即全国总共分为 62 个样本,将其代入式(4)计算得出总体泰尔指数,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同时进一步将 62 个样本按地区划分为 31 个组,每组包括 1 个城镇样本和 1 个农村样本,在此基础上将总体泰尔指数分解为组间泰尔指数  $T_w$ (反映全国 31 个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和组内泰尔指数  $T_g$ (反映全国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差距)。

## (三) 测算结果及分析

在上述测算方法体系下,测算得出的 1949—2019 年中国总体及地区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测算结果,如表 1 所示。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本文进一步绘制了 1949 年以来中国泰尔指数的变化曲线以及其内部构成占比曲线(如图 1 所示),以更直观地呈现 70 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变化表现。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1949—2019 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 1. 1949—1952 年收入分配状况变化不大但收入分配差距明显偏高

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创伤,国家建设百废待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尚未起步,因此这一时期居民收入分配

① 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 1982 年之后才正式确立并全面推行,因此此前年份的相关数据可以用于反映改革开放前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生产间的关系。《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整理了 1957、1964、1965 以及 1977 年以后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可以利用上述 9 年(1957、1964、1965 以及 1977—1982 年)的历史数据构建时间序列模型,通过回归分析探索农民收入与农作物产量间的关系。

② 因篇幅限制未将有关结果在正文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状况没有太大变化,但收入分配差距明显偏大。1949—1952年,中国总体泰尔指数基本稳定在0.185左右,比70多年来的平均值高出约17%。从这一时期收入分配差距的构成看,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贡献率分别为55%和45%,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地区间和城乡间的差距都较大,也都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整体较大的重要成因。

表1 1949—2019年中国总体泰尔指数及其分项值

年份	总体泰尔指数	组间(地区)泰尔指数	组内(城乡)泰尔指数	年份	总体泰尔指数	组间(地区)泰尔指数	组内(城乡)泰尔指数
1949	0.187	0.087	0.100	1985	0.060	0.020	0.040
1950	0.183	0.081	0.103	1986	0.082	0.026	0.056
1951	0.184	0.080	0.104	1987	0.088	0.030	0.058
1952	0.184	0.080	0.104	1988	0.097	0.038	0.060
1953	0.218	0.090	0.128	1989	0.111	0.040	0.070
1954	0.231	0.093	0.138	1990	0.098	0.031	0.067
1955	0.208	0.073	0.135	1991	0.122	0.041	0.082
1956	0.247	0.081	0.165	1992	0.143	0.047	0.097
1957	0.276	0.086	0.190	1993	0.171	0.060	0.111
1958	0.218	0.082	0.136	1994	0.178	0.063	0.114
1959	0.255	0.101	0.154	1995	0.161	0.059	0.102
1960	0.297	0.109	0.187	1996	0.139	0.053	0.085
1961	0.316	0.110	0.206	1997	0.131	0.052	0.079
1962	0.299	0.100	0.199	1998	0.131	0.052	0.079
1963	0.286	0.093	0.193	1999	0.141	0.055	0.086
1964	0.229	0.066	0.163	2000	0.161	0.066	0.095
1965	0.178	0.058	0.120	2001	0.170	0.069	0.102
1966	0.162	0.047	0.115	2002	0.175	0.066	0.109
1967	0.162	0.049	0.113	2003	0.203	0.075	0.128
1968	0.167	0.049	0.118	2004	0.196	0.071	0.125
1969	0.183	0.044	0.139	2005	0.197	0.071	0.126
1970	0.140	0.039	0.101	2006	0.199	0.071	0.129
1971	0.132	0.035	0.096	2007	0.192	0.063	0.129
1972	0.149	0.035	0.114	2008	0.185	0.058	0.127
1973	0.121	0.028	0.093	2009	0.187	0.063	0.124
1974	0.129	0.033	0.096	2010	0.176	0.062	0.114
1975	0.120	0.029	0.091	2011	0.163	0.058	0.105
1976	0.120	0.033	0.087	2012	0.156	0.054	0.103
1977	0.123	0.029	0.094	2013	0.135	0.048	0.088
1978	0.100	0.030	0.070	2014	0.129	0.046	0.083
1979	0.081	0.024	0.057	2015	0.125	0.044	0.081
1980	0.079	0.026	0.053	2016	0.122	0.043	0.079
1981	0.056	0.019	0.037	2017	0.120	0.042	0.077
1982	0.047	0.018	0.028	2018	0.116	0.042	0.075
1983	0.040	0.018	0.022	2019	0.113	0.041	0.071
1984	0.046	0.018	0.028	年均值	0.158	0.055	0.103

## 2. 1953—1961年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扩大

为了弥补重工业发展滞后的短板,全国在不少城市地区集中上马了一大批重工业项目,这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在客观上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后在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秩序受到影响,总体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1961年全国总体泰尔指数升至0.316,比1952年上升

了 0.132, 达到 1949 年后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 地区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分配差距都在扩大, 其中城乡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1961 年组间泰尔指数和组内泰尔指数分别为 0.110 和 0.206, 分别比 1952 年上升 0.030 和 0.102; 1961 年城乡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达到 65%, 比 1952 年提高约 9 个百分点, 成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 3. 1962—1982 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回落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逐步推进, 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的发展也使不同地区不同群体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缩小, 这也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带有一定的“平均主义”色彩不无关系。至 1982 年中国正式确立并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夕, 中国总体泰尔指数已经降至 0.05 以下, 达到 194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收入分配差距构成看, 这一时期城乡差距的贡献率逐步提高, 在 70 年代组内泰尔指数对总体泰尔指数的平均贡献率达到 75% 左右。

### 4. 1983—2003 年收入分配差距再度波动升高

改革开放后至 21 世纪初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再度扩大。1982 年农村施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市场经济建设新时期, 一系列的重大经济政策变革显著推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 逐步打破“大锅饭”, 也使得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市场政策等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地区间城乡间发展条件的差异也导致其经济发展差距扩大, 带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明显上升。1994 年全国总体泰尔指数升至 0.178, 经历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短暂回落后, 2003 年进一步升至 0.203 的高位, 收入分配差距达到了 1965 年以后的新高。从分项指数看, 这一时期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贡献率基本呈“四六开”状态, 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有所改善, 这与同时期开始的“进城打工潮”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增长有很大关系。

### 5. 2004 年以来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

21 世纪以来, 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扩大, 一些经济社会问题也随之显现, 党中央对此及时进行政策上的调整, 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全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随之开始逐步缩小。2012 年, 全国总体泰尔指数降至 0.156, 已低于历史平均值。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对社会民生发展的重视程度明显提高, 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问题, 随着脱贫攻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稳步推进, 全面小康不断取得积极成效, 全国收入分配差距呈现稳定连续下降的良好态势。2019 年, 经过“连降”后全国总体泰尔指数达到 0.113 的历史较低水平。从分项构成看, 近年来组间泰尔指数和组内泰尔指数都呈稳定下降态势, 2019 年城乡差距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已经降至 63%, 比 2012 年下降了 2.2 个百分点, 但仍是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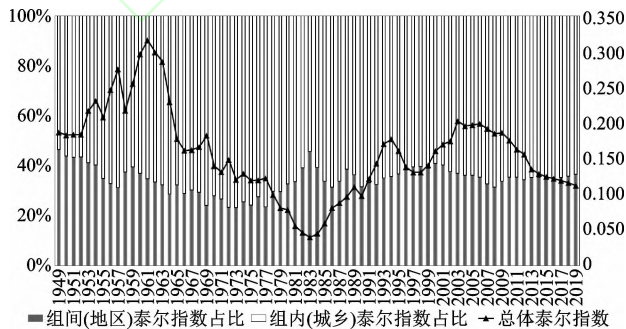


图 1 1949—2019 年中国总体泰尔指数及其分项占比曲线

## 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述测算结果从全局视角展示了 1949 年以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发展变化, 但要推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继续缩小以夯实共同富裕的发展基础, 还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 为此本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 实证检验相关经济社会因素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与此同时, 为了更具体地体现相关因素对不同维度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果, 提高研究结果的政策参考价值, 本文分别使用组内泰尔

指数、组间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检验不同因素对中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及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 (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广泛,许多文献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各类因素的影响效果,王小鲁和樊纲将这些因素归纳为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收入再分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制度性因素四类,同时进一步强调了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sup>[10]</sup>。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上述四方面因素进一步归纳为经济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两大类。

第一大类是经济性因素。经济发展是居民收入增长的前提基础,因此地区经济、城乡经济发展态势直接影响了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使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发生变化。其中,经济总量扩张即宏观经济增长是影响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最直接因素,但其影响效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经济增长加速往往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更倾向于“效率”优先,这易于导致不同智力禀赋、资源占有状况的群体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而当资源配置更倾向于“公平”优先时,虽然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但也可能导致经济效率损失从而诱发经济增长减速,因此宏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可能存在反向相关关系<sup>[10]</sup>;但另一方面,如果落后地区、农村地区利用好发优势或政策优势获得了较好的经济发展机会,由于其基数小负担轻,往往会形成更明显的增长效果,则有助于推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从而形成二者的正向相关关系。因此总的来看,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差距可能产生不同影响。

除了经济总量,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比如工业发展更有利于推动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从而可能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发展服务业由于成本投入小、就业带动效果好,可能产生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即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不同群体的收入造成差异化影响<sup>[21]</sup>。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则更有利于沿海地区居民收入增长,从而拉大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分配差距<sup>[22]</sup>。此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财政也是进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因此财税收支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等因素也可能对不同地区或城乡间居民收入造成不同影响,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sup>[23]</sup>。

第二大类是社会性因素。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人口的跨城乡跨地区流动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因此城镇化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具有较强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可以带动城镇产业发展从而加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升,产生拉大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而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异地城镇化还可能导致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因为减少了农村收入分配中的“人口分母”从而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水平,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这种双向作用机制可能导致城镇化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收入分配差距产生非线性影响<sup>[24-25]</sup>。

在城镇化因素之外,正如王小鲁和樊纲所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这些也可以归结为社会性因素<sup>[10]</sup>。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既可能为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增收提供契机从而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进一步提高高收入地区和城镇地区经济要素配置效率从而继续拉大收入分配差距<sup>[19]</sup>;教育的发展也可能存在类似的作用机制,既可能增强低收入地区发展的智力支撑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也可能加大城乡地区间人力资本水平的差距从而拉大收入分配差距<sup>[26]</sup>。

###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不少经济社会因素都会对地区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影响,且不少因素的作用机制和效果都存在不确定性,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运用实证手段探讨相关因素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实际影响效果。综合考虑理论分析和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经济开放、政府宏观调控、城镇化、教育发展、交通发展等7方面的经济社会因素,并将时间线拉长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1949—2019年,以期在中国经济体制经历巨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定量研究这些因素对不同时期不同维度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实际影响。

为此,本文首先参照已有研究常用的方法对上述7个方面的指标进行量化。(1)使用不变价人均GDP的对数衡量经济增长(LnGDP)。(2)考虑到产业结构向非农化和高级化转型可能对不同时期的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均纳入实证分析框架,其中产业结构非农化(SRT1)使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GDP



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STR2)则使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 GDP 的比值表示。(3)使用进出口总额与 GDP 的比值反映经济对外开放(TRAD)。(4)使用地方财政收入与 GDP 的比值反映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FIN)。(5)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城镇化水平(URB)。(6)使用人均铁路里程和人均公路里程的加权和表示交通发展水平(LnTRAN)<sup>①</sup>。(7)考虑到 70 年历史数据的可得性,对教育发展水平(LnEDU)则基于各类学校毕业生人数计算,即通过衡量教育系统每年向社会输出的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总量来反映国民教育水平的发展情况,具体计算公式为:(小学毕业人数×6+初中毕业人数×9+高中毕业人数×12+高等院校毕业人数×16)/人口总量。在相关变量符号中,Ln 表示对原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

本部分数据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住户调查年鉴》以及《1954 年农家收支调查简要资料》等,部分缺失数据进行了线性插补处理。变量的基本统计信息如表 2 所示。

表 2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组间(地区)泰尔指数	GAPdq	71	0.055	0.024	0.018	0.110
组内(城乡)泰尔指数	GAPcx	71	0.103	0.040	0.022	0.206
经济增长	LnGDP	71	6.543	1.368	4.607	9.065
产业结构非农化	STR1	71	0.732	0.133	0.448	0.930
产业结构高级化	STR2	71	0.328	0.089	0.216	0.539
经济对外开放	TRAD	71	0.243	0.176	0.050	0.665
政府调控能力	FIN	71	0.223	0.063	0.103	0.393
城镇化水平	URB	71	0.283	0.144	0.106	0.606
交通发展水平	LnTRAN	71	2.721	0.554	1.632	3.802
教育发展水平	LnEDU	71	5.323	1.018	2.211	6.366

为进一步确定应将哪些因素纳入对应模型,本文首先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从各变量检验结果看,经济增长、产业结构非农化、经济对外开放、政府调控能力 4 个变量在两组检验中都同时通过了 F-tset 和 Chi2-tset,表明这 4 个变量既是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也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水平、教育发展水平两个变量在 M1 中通过了 F-tset 和 Chi2-tset,但在 M2 检验中不显著,表明这两个变量仅是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产业结构高级化变量只在 M2 中通过检验,表明其仅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交通发展水平在两组检验中均不显著,表明其不是地区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

表 3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M1)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M2)		
	F-tset	Chi2-tset	滞后阶数	F-tset	Chi2-tset	滞后阶数
LnGDP	5.84***	26.99***	4	2.95**	13.63***	4
STR1	7.30***	33.73***	4	3.67***	22.00***	5
STR2	1.46	6.73	4	2.23*	16.75**	6
TRAD	3.92**	13.11***	3	3.32**	15.32***	4
FIN	3.96**	13.23***	3	3.57**	16.49***	4
URB	3.03**	14.01***	4	2.01	12.05	5
LnTRAN	0.52	0.55	2	0.49	1.62	2
LnEDU	3.74***	17.28***	4	1.32	6.08	4

注:\*\*\*、\*\*、\* 分别代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基于上述因素分析和检验结果,本文分别构建如下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各因素对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sup>①</sup> 铁路的线路总里程虽然远小于公路但其运输效率远高于公路,因此将二者直接简单相加难以反映铁路的实际作用,为了更好地反映两类运输线路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增收的实际支持作用,本文基于二者线路长度和年度货物周转量的比例关系,将铁路的权重设为 0.9,公路的权重设为 0.1,以公路和铁路线路里程的加权之和反映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GAPdq_t = \alpha_0 + \alpha_1 \ln GDP_t + \alpha_2 STR1_t + \alpha_3 TRAD_t + \alpha_4 FIN_t + \alpha_5 URB_t + \alpha_6 \ln EDU_t + \epsilon_t \quad (6)$$

$$GAPcx_t = \alpha_0 + \alpha_1 \ln GDP_t + \alpha_2 SRT1_t + \alpha_3 SRT2_t + \alpha_4 TRAD_t + \alpha_5 FIN_t + \epsilon_t \quad (7)$$

其中,  $t$  表示时间,  $\epsilon$  为随机干扰项。GAPdq 和 GAPcx 分别代表使用组间泰尔指数和组内泰尔指数表示的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与此同时,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体制变化较大,因此在使用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的同时,本文也将样本划分为 1949—1982 年和 1983—2019 年两个时段分别进行回归,用于反映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情况<sup>①</sup>。

### (三)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表 4 为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其中 M1 为基于全部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M2 为 1949—1982 年数据的回归结果,用于反映改革开放前的情况,M3 为 1983—2019 年的回归结果,用于反映改革开放之后的情况。从检验结果看,各模型均通过了  $F$  检验,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均达到 0.9 以上,表明所选取的变量较好地囊括了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

表 4 中国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M1 (全部样本)		M2 (改革开放前)		M3 (改革开放后)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LnGDP	-0.087***	-8.76	-0.119***	-6.58	-0.052***	-2.83
STR1	0.352***	9.04	0.316***	3.49	0.522***	5.49
STR2	—	—	0.044	0.37	-0.165**	-2.34
TRAD	0.102***	8.57	0.227***	2.92	0.038***	3.21
FIN	-0.087***	-2.80	-0.027	-0.37	-0.147**	-2.53
URB	0.477***	3.83	0.442**	2.59	0.237	1.62
LnTRAN	—	—	-0.023	-0.99	-0.013	-1.39
LnEDU	-0.016***	-4.37	-0.001	-0.36	0.013	0.64
常数项	0.340***	6.64	0.461***	4.70	-0.040	-0.33
Adj-R <sup>2</sup>	0.912		0.968		0.943	
F 检验	91.71(0.000)		124.71(0.000)		75.69(0.000)	

注:F 检验括号内为  $p$  值。为讨论相关因素在不同时期可能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在分阶段回归中所有影响因素均被纳入模型。下同。

从经济因素相关变量的估计结果看,经济增长(LnGDP)在 M1 中显著且系数为负,意味着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对中国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估计系数为-0.087,根据 70 多年来人均经济总量增幅估算,经济发展对缩小泰尔指数的作用达到 0.38 左右<sup>②</sup>,而泰尔指数的年均值仅为 0.16,这意味着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 1949 年以来中国未能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那么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可能扩大到相当高的水平。这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得以普遍改善,且在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福利发展等的带动下,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水平,从而带动了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减小。但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对比看,LnGDP 在 M3 中的回归系数仅为-0.052,绝对数值明显小于 M2 中的-0.119,表明经济发展对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有所弱化,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地区依托于区位和政策优势经济获得了更好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其居民收入水平的前沿地位,降低了经济发展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积极效应。

产业结构非农化(STR1)的估计结果显著且系数为正,在 M1 中达到 0.352,意味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泰尔指数扩大约 0.04,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影响效果

① 虽然 1978 年是改革开放元年,但是中国城乡经济运行体制真正开始变革则始于 1982 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真正确立和全面推行,因此本文研究将 1982 年作为回归分析中改革开放的实际分界点,这同时也使得前后两个时段的时序长度更加相近,便于对比回归结果。

② 估算方法为:模型中变量回归系数×该变量指标在 70 年的变化幅度。下文对各因素影响程度均参照此方法进行估算。

进一步提高到了 0.05。这一结果表明,随着工业服务业更快发展,中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其原因在于工业服务业对居民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带动作用,中国产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也导致了居民收入水平的地区不平衡;改革开放之后东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更快提高,产业结构非农化快速推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推动作用。虽然 STR2 并未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但从分时段回归对比看,这主要是因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变化,STR2 在 M3 中显著且估计系数达到 -0.165,意味着改革开放之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会带动泰尔指数缩小约 0.02,2019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4.3%,比 1982 年提高 31.7 个百分点,据此估算这 30 多年间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带动中国泰尔指数缩小了 0.05 左右。这一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服务业的发展对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产生了较明显的积极作用,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发展方式更加灵活的服务业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欠发达地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提升渠道。

经济对外开放变量(TRAD)在三个回归中均高度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这与东部沿海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在国际经贸和资本往来中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有关。从系数对比看,TRAD 在 M2 中的系数达到 0.227,远高于 M3 中的 0.038,表明改革开放之前国际贸易对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更大,这可能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各地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都处于稀缺状态,东部地区依托于区位优势发展对外贸易形成的资本积累,对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产生了更强的边际拉动力;而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经济趋于活跃,国际经贸和资本往来都更加频繁,要素积累水平快速提升,因此对外贸易对地区经济发展边际拉动力的差距缩小,降低了其对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效果。政府调控能力变量(FIN)在模型 M1 中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和宏观调控是推动中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重要积极因素,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估计系数达到 -0.147,表明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政府对市场的调控能力也不断增强,宏观调控政策对防止中国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产生了积极作用。

从社会因素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城镇化水平(URB)在 M1 中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城镇化的发展总体上扩大了中国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但从 M2 和 M3 估计结果的对比看,改革开放前后其影响效果也发生了显著变化。URB 在 M2 中的系数为 0.442,意味着改革开放前城镇化率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将会带动泰尔指数扩大约 0.04,而 1982 年末中国城镇化率为 21.1%,恰好比 1949 年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左右,结合改革开放前中国较低的泰尔指数看,城镇化是这一时期地区居民收入分配水平差距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而这一现象的产生也与计划经济体制下产业布局导致的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有关,劳动力随着产业布局向部分重工业城市集中,导致了城镇化背景下地区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但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不再是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显著影响因素,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崛起、二三线城市发展水平快速提升,由中西部农村向东部城市转移的城镇化路径出现改变,本土城镇化趋势有所增强,部分抵消了劳动要素流失带来的地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

教育发展水平变量(LnEDU)在 M1 中显著且估计系数为负(-0.016),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公共教育发展指数每提高 1%,将带动泰尔指数缩小约 0.02。进一步测算显示,1949—2019 年公共教育对中国泰尔指数的总影响程度约为 0.07,这也意味着如果 1949 年之后未能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那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2019 年以泰尔指数衡量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将扩大至 0.18 左右,这充分显示了教育事业对推进社会收入公平、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积极意义。这一回归结果也表明,1949 年以来中国教育发展为本地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的积极效应要强于人才向外地流失带来的消极效应,从而推动了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此外,交通发展水平变量(LnTRAN)在 M2 和 M3 中的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表明交通设施建设在改革开放前后都没有对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产生显著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对落后地区收入增长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但同时也会有效带动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且使用率更高、经济效益更好的交通道路也主要分布在中东部等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因此综合起来交通发展并未显著作用于收入分配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交通发展对各地区居民收入增长都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 (四)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表 5 为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从检验统计指标看,各模型均通过了  $F$  检验,调

整后的拟合优度均达到 0.8 左右甚至更高,表明所选取的变量较好地反映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

表 5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M1 (全部样本)		M2 (改革开放前)		M3 (改革开放后)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系数	T 值
LnGDP	-0.159***	-5.93	-0.222***	-3.87	0.002	0.06
STR1	0.397***	3.77	0.030	0.11	0.420**	2.12
STR2	0.573***	2.96	0.332	0.87	0.241	1.64
TRAD	0.207***	6.45	0.218	0.89	0.118***	4.83
FIN	-0.149*	-1.77	0.361	1.54	-0.060	-0.50
URB	—	—	0.709	1.32	-0.556*	-1.82
LnTRAN	—	—	0.029	0.40	0.025	1.26
LnEDU	—	—	0.039***	3.15	0.035	0.86
常数项	0.404***	2.93	0.708**	2.29	-0.478*	-1.92
Adj-R <sup>2</sup>	0.773		0.863		0.925	
F 检验	30.82(0.000)		26.97(0.000)		56.28(0.000)	

从经济因素相关变量的回归结果看,经济增长(LnGDP)在 M1 中依然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经济发展推动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而从 M2 和 M3 回归结果的对比看,这种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前。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改革开放前农业在经济构成中占比较高,1982 年之前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接近 40%,与第二产业基本相当,如果将工业和建筑业分开来看,则第一产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较大,而农业生产又是农民实际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就导致了第一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农民增收三者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由于工资粘性和增长刚性的存在,城镇职工收入水平的变化可能与经济增长不同步,导致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带动农民收入改善进而缩小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改革开放之后,以工业服务业为代表的城市经济迅速崛起,经济发展对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影响明显弱化。

产业结构非农化(STR1)和产业结构高级化(STR2)在 M1 中都显著且估计系数为正,表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这是因为城镇拥有更好的工业服务业发展基础,产业的发展更好地带动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从而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STR1 的估计系数达到 0.397,这意味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将会导致泰尔指数扩大 0.04,根据 70 多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程度估算,STR1 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达到 0.18,进一步根据变量 STR2 的系数估算,上述影响中有 70%~80%是由于服务业占比上升导致的,这一结果充分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总体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农村地区存在服务业发展滞后的短板。

经济对外开放(TRAD)在 M1 中显著为正且在改革开放后的影响显著大于改革开放前。这表明城镇居民在对外开放中获得了更多的收入红利,改革开放后城乡经济对外开放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也导致这一特征表现得更加明显。根据系数估算,1982 年以来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对组内泰尔指数的影响程度为 0.03,虽然相比于产业结构变化而言 TRAD 的影响明显偏小,但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政府调控能力(FIN)在 10%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从其较低的显著性水平和在 M2 和 M3 中都不显著的回归结果看,这种影响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地方政府在政策层面还要更加关注农村经济发展、大力推动乡村振兴,以更快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由于城镇化、教育和交通发展水平 3 个因素变量均未通过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因此需要对比分析 M2 和 M3 中的回归结果,以观察社会因素变量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特征。城镇化水平变量 URB 在 M2 中不显著而在 M3 中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后城镇化的发展推动了城乡

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一方面通过促进农民在非农产业就业带动了农村家庭收入水平整体提高,另一方面也缓解了农村冗余劳动力的增收压力。URB 在 M3 中的估计系数达到  $-0.556$ ,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每提高 10 个百分点,将带动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约 0.06,根据 1982 年以来城镇化率的变化幅度估算,其对泰尔指数的总影响度达到 0.22,这说明推动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积极作用已经足以弥补产业结构升级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负面影响。

交通发展水平变量(LnTRAN)在各模型中均不显著,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也存在双向影响且其作用效果大体相当。教育发展水平变量(LnEDU)在 M2 中显著为正但在 M3 中不显著,意味着在改革开放以前教育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现象不再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具有明显城市倾向性的问题更加突出,这导致城镇人口更容易通过接受教育实现能力的提升进而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引起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地区中小学等基础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这有效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劳动技能,进而促进其收入增加,有助于缩小其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但城乡教育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教育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机制仍在发挥作用,两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导致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影响不显著。

####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合理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本文系统估算了改革开放前各省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利用改革开放之后居民收支统计调查数据,以泰尔指数为核心指标,对中国 1949—2019 年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进行量化测度和分解,根据测算结果进一步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影响中国地区和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经济社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波动较为明显,大致可以分为五个不同的阶段;21 世纪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逐年稳定缩小,2019 年泰尔指数降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最低水平。从泰尔指数分解看,城乡差距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组成部分,年均占比达到 60%左右。第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政府宏观调控、城镇化、教育发展水平等经济社会因素是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经济增长、教育发展水平、政府宏观调控总体上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经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则主要表现为扩大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产业结构非农化总体上扩大了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则在改革开放前后存在明显不同。第三,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政府宏观调控等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前经济增长总体上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效果有所减弱;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更有利于城镇经济发展从而在总体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改革开放后经济对外开放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城镇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产生了积极作用;教育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影响不再显著。

本文研究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推动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夯实共同富裕发展基础。要达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两个主要方面下功夫。当前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总体仍然不高,还要继续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这就要求必须有持续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作为支撑。与此同时,本文的实证结果也表明,经济增长总体上推动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尤其在缩小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上效果明显。因此,无论从发展“富裕”还是提升“共同”上看,都必须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此,一方面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增强宏观政策的针对性、稳定性、有效性,进一步强化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效果,保障中国经济短期平稳运行和长期健康发展。

第二,积极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从本文的测算结果看,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仍然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构成,农民收入水平偏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短板,因此大力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就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从本文关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积极作用有所减弱,为此要进一步加快推动乡村振兴,拓展农村居民增收渠道,使农民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实际收益。

此外,还要积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发展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二、三产业发展基础较弱,为此,一方面要发挥农村地区的农业比较优势,加大对农业发展的财政和人才支持力度,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要推动城乡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提高二、三产业对农民增收的支持效果。

第三,加快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提升共同富裕动力引擎。产业是就业的基础,产业发展是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因此培植优势产业是欠发达地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和发达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进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本文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缩小了地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这主要是由于服务业吸纳就业能力强,拓展了欠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来源,为此要继续支持引导欠发达地区服务业发展,进一步增强其对居民稳定增收的带动作用。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发展质量总体不高,未能更好地带动居民加快增收,为此要以提质增效为核心推动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发展,不断提高工业企业的盈利能力,促进居民收入更快增长。

第四,提高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对外开放水平,强化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保障。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背景下,要推动居民收入均衡增长,不仅要利用好国内资源,也要充分利用外资外贸在经济增长和居民增收上的积极作用。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总体拉大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这主要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仍然相对偏低,为此要在这些区域加快有利于对外贸易发展的物流、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优化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营商环境,加快推动贸易便利化发展,促进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地区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增强其对居民收入增长的带动作用。

#### 参考文献:

- [1] CHANG G H. The cause and cure of China's widening income disparit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2, 13(4): 335-340.
- [2] 罗楚亮,李实,岳希明.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变动分析(2013—2018)[J]. *中国社会科学*, 2021(1): 33-54.
- [3] 李天健,王润红.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1995—2016年[J]. *宏观经济研究*, 2018(12): 67-78.
- [4] 吴彬彬,李实. 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变化:2002—2013年[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 39(10): 31-44.
- [5] 张涛. 中国收入差距的变动及其原因分析:1985—2012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6, 33(12): 3-22.
- [6] 杜群阳,俞航东. 中国多维城市空间结构与地区收入差距[J]. *地理科学*, 2020, 40(5): 720-729.
- [7] YAMAMOTO D. Scales of regional income disparities in the USA, 1955—2003[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8, 8(1): 79-103.
- [8] 徐瑾. 中等收入阶段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再检验[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2017, 33(5): 51-61.
- [9] HE Q C, ZOU H F. The Kuznets curv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does not hold in China: a critical assessment[R]. Beijing: CEMA Working Papers 607, 2018.
- [10] 王小鲁,樊纲. 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10): 24-36.
- [11] 周国富,陈菡彬. 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分析[J]. *统计研究*, 2021, 38(2): 15-28.
- [12] 魏浩,耿园. 对外贸易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7): 89-99.
- [13] 李成友,孙涛,王硕. 人口结构红利、财政支出偏向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学动态*, 2021(1): 105-124.
- [14] 张耀军,柴多多. 人口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耦合关系研究[J]. *人口研究*, 2018, 42(6): 61-73.
- [15] KUO S. Urbaniz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case of Taiwan, 1966—1980 [M]//SYRQUIN M, TAYLOR L, WESTPHAL L 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Pittsburgh: Academic Press, 1984: 217-234.
- [16] 周世军,周勤. 政策偏向、收入偏移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J]. *财贸经济*, 2011(7): 29-37.
- [17] 李拓,李斌. 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2): 73-83.
- [18] 关会娟,李昕,谭莹. 教育投入、交易成本与区域收入差距[J]. *财经研究*, 2019, 45(7): 97-111.
- [19] 杨茜,石大千. 交通基础设施、要素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J]. *南方经济*, 2019(9): 35-50.
- [20] LI B, LI T, YU M, et al. Can equaliz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narrow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A spatial

econometrics approach[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4: 67-78.

- [21] 林毅夫, 陈斌开. 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J]. *经济学(季刊)*, 2013, 12(4): 1109-1140.
- [22] 韩军, 刘润娟, 张俊森. 对外开放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南方谈话”和“入世”后效果的实证检验[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2): 24-40.
- [23] 徐彦坤, 张帆, 祁毓. 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自地级市和微观个体的证据[J]. *财经论丛*, 2021(7): 25-35.
- [24] SU C W, LIU T Y, CHANG H L, et al. Is urbanization narrowing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 cross-regional study of China[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5, 48: 79-86.
- [25] 闫东升, 孙伟, 陈东, 等. 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 31(5): 28-36.
- [26] 吴强, 柳潇, 丁文娜. 教育投入影响收入水平及收入差距的异质性效应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20(5): 111-117.

### Research on Residents' Income Gap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 1949—2019

XIONG Xiao-lin<sup>1</sup>, LI Tuo<sup>2</sup>

(1.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2. Comprehensive Department,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Beijing 100045, China)

**Abstract:**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gradually achieve the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This paper takes Theil index as the core index, quantitatively measures and decomposes the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from 1949 to 2019, and further constructs a dynamic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alculation to empirically test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between regions and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residents'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has shown a periodic wave dynamic trend. On the whole, the current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is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historical average level and shows a steady narrowing trend. Urban and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is the main cause of the overall larg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in China. Second, economic growth,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macro-control are generally conducive to narrowing the reg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generally narrowe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regional residents, but the non-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reverse effect. Economic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urbanization are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effect of expand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of regional residents. Thir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widened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conomic growth narrowe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ut this effect has weakene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widene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on the whole. Urbanization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narrowing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widene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no longer significant.

**Key words:** income disparities; Theil Index; influence factor;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 崔国平)